

锐观察

当代中国,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广泛社会变革。在这个动荡的时代,我们该如何看待社会上普遍出现的焦虑情绪?焦虑情绪产生的原因何在?如何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?
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了他的思考和回答。

“除了战乱,人们从没这样焦虑过”

——对话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



人物简介

吴忠民,1959年出生于青岛,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、主任,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、二层次入选者。主要研究方向:社会公正研究、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究等。

社会焦虑几乎覆盖所有人群

记者:近来,大家常常感到当下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焦虑情绪,您怎么看这种现象?

吴忠民:所谓社会焦虑,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。现在,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。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、农民群体的成员,还是处境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干部群体、企业家群体的成员,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,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,都有焦虑不安、浮躁不定的现象。这种现象,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。从历史上看,除了战乱年代,人们没有像现在这样焦虑过;往以后看,以后人们也会焦虑,但社会焦虑的波及面和强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。

记者: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焦虑情绪?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?

吴忠民:正像胡锦涛同志在“七一”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: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。这种变革在给我们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,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。

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、变革,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,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。人们有时觉得无章可循,不确定性因素增加。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,前景的不确定性,心里不踏实,人们对于未

来不可预期。这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现象。

记者:按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,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,老百姓的经济生活得到了大幅度改善,但为什么社会焦虑现象反倒更加突出了?

吴忠民:我以为,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,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、对未来美好生活所表现出的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。

记者:也就是说,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相对提高了,不仅满足于温饱了,因此,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,才会产生焦虑。

吴忠民:是的。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,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、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,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,于是,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,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,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,而放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的行为取向。

但是,应该指出的是,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,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,而且,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,由于过于追求GDP,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。凡此种种,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。

标本兼治化解社会矛盾

记者:您能否举几个例子,具

体讲讲中国能否跳出“发展悖论”的陷阱,有哪些独特的优势?

吴忠民:首先人心普遍安定。现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,这就是:无论何种类型的折腾,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而言,几乎没有赢家,几乎全部都是输家;社会稳定,社会的安全运行,是经济发展、民生改善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。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珍惜社会稳定。中国人期待稳定,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,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。

其次,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。一些由自然灾害所引发的公共危机,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,并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。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,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,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。在这方面,2003年中国抗击“非典”行动、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,都是典型的案例。

第三,务实、平和、宽容精神的传统。几千年来,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,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。

第四,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。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,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。比如,中国的房价飞涨,大批年轻人依靠自己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,所以许多人是依靠父母和祖父母的帮助购买住房。类似生活困境的缓解,能够使受到家人帮助的社会成员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社会怨

恨,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。

第五,互联网的减压作用。截至2011年6月底,我国网民规模达4.85亿人。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。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着两重意义的广泛影响。一方面是互联网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消极影响,另一方面,如果运用得当,互联网则能够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影响——比如,有效减压、有效辟谣、有效批评、有效建议。

记者:您认为,该如何化解社会焦虑情绪呢?

吴忠民: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,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,但也不必过于担忧,以至于失去信心。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。就此而言,我认为,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。从治本的角度看,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,也就是“七一”讲话中指出的那样,“推进社会建设,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,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。”比如,目前猪肉价格首现环比下降;国务院加快了供地进度,保证保障房用地;为了抑制通胀,央行加息、收紧贷款,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……

总之,只有正视矛盾,解决矛盾,才能化解社会焦虑,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,消除社会的和谐因素,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。

本版稿件据《中国青年报》